

「空间·源」

超越线性叙事：螺旋式发展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空间演进

李参军, 何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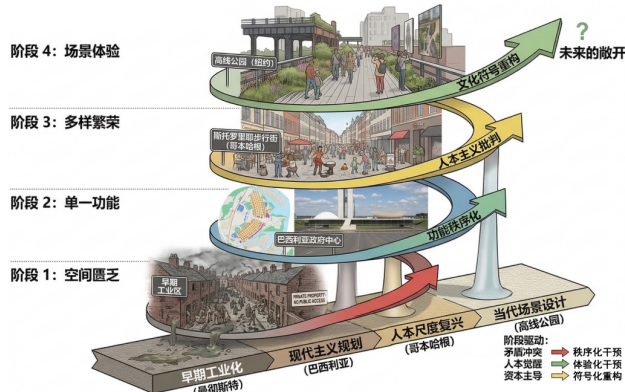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 本文论证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复杂过程。提出了从缺乏公共空间、单一性公共空间、多样化公共空间到场景营造的四阶段演进模型,继而对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及内在矛盾做了批判性分析,揭示了后续阶段是如何吸收、转化并超越前一阶段的特征。由此引出对当代及未来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理论启示,促进了对公共空间“公共性”本质的深入讨论。

关键词: 城市公共空间;螺旋式演进;公共性引言

1 引言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中在所有时间向所有人开放的区域,是城市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容器,它包括城市的街道、广场、公园、绿地、公共沙滩、河道、湖面、公共运动场地以及开放的建筑内庭院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特质是开放性和公共性。^[1]在既有研究中,线性进步叙事是阐释城市公共空间演进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路径。但该叙事往往会将公共空间的发展描绘为一个清晰的、单向的进阶过程。这一脉络为我们理解规划思潮的迭代与空间形态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在学术与实践层面均影响深远。然而,这种线性视角在强调历史方向性的同时,亦存在理论局限。其未能系统阐释公共空间演进中“螺旋式”发展的核心机制——即后续阶段如何既批判性扬弃前一阶段的内在矛盾,又创造性转化其合理遗



产,从而在更高维度上实现空间形态与公共性本质的重构。本文由此引入“螺旋式演进”框架,旨在揭示公共空间从“虚空”、“宣示”、“繁荣”到“体验”四个阶段的辩证发展历程,并剖析其跃迁的内在动力,从而提供一个理解其复杂现代化历程更具整合性与历史穿透力的新视角(图1)。

通讯作者: 何柯 单位: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 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 2025-02-01 录用日期: 2025-04-17

DOI: <https://doi.org/10.58244/spatium.263824>

2 “虚空”——缺乏公共空间阶段

2.1 缺乏公共空间阶段的特征

第一阶段“缺乏公共空间”的城市，其核心特征在于显著缺少或完全没有可供市民共同使用、自由进入的开放性社区空间。在这一阶段，城市的发展往往被其他更为紧迫或被认为更重要的议程所主导，例如追求工业生产效率、应对快速且无序的城市化扩张，或是固守严格的社会及空间隔离制度。这些主导力量要么忽视了营造公共生活空间的需求，要么在客观上阻碍了这类空间的形成。工业化带来了急剧的城市化，同时也造成了恶劣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城市居民普遍缺乏能够获得休憩和交往的场所。早期的工业城市常常呈现出土地功能混乱、各类建筑交错杂乱的布局，并且伴随着新兴社会阶层在居住空间上的隔离^[2]。

此种“虚空”绝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缺失，实质上是社会、政治诸种缺位的象征，即当时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人对社区生活、休闲娱乐、集体交往的基本需求都未被主导性的经济、政治力量认真对待，甚至遭到主动压制。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的分析已经十分清楚、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有其专属的活动空间，而工人阶级生活在几乎不存在今日所理解的公共空间的环境中。因此，这一状况绝非偶然，乃是工业资本主义逐利逻辑极其自然、直接的产物。

2.2 缺乏公共空间阶段的案例研究：19世纪的曼彻斯特

19世纪的曼彻斯特被称为“第一个工业化城市”^[3]，它典型地展现了工业革命早期城市中公共空间的极度匮乏，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犀利的描绘了这座城市惊人的空间差异：一边是相对光鲜的商业区和资产阶级聚居区，另一边则是广阔而悲

惨的工人阶级生活区。

工人区街道普遍未经铺设，泥泞肮脏，缺乏排水系统和下水道，取而代之的是散发着恶臭的污水坑。工人区的住房拥挤不堪，破败简陋。更为讽刺的是，恩格斯指出，城市布局中存在一种“虚伪的规划”，即通过商业店铺的临街立面来刻意遮蔽其后工人区的苦难景象，使得富裕阶层可以穿行于城市主干道而无需直面其所依赖的劳动者的悲惨处境。

曼彻斯特的案例体现了多数城市居民“缺乏公共空间”的现实处境。城市的形态实质上由工业生产的需要及资本积累的逻辑严格支配，故而工人的健康、福利、社区生活都不在城市建设的正式考虑之列。少数被称作“开放”的地区，实为垃圾堆积、疾病传播的场所，绝非真正的休憩交往空间。

2.3 失控的混沌到强制的秩序：螺旋式演进的初步启动

第一阶段这种对公共空间的绝对剥夺并非一种稳定状态，随着工业化带来的极度拥挤、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以及社会阶层矛盾的日益尖锐，这种状态达到了城市承载力的极限。为了拯救这种失控的城市环境，重塑社会秩序，国家力量与早期现代主义规划者开始强势介入。然而，正如极度的匮乏往往会催生对绝对秩序的迷恋，这种反弹带有强烈的矫枉过正色彩。为了彻底扫除第一阶段的肮脏与混乱，城市空间建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以宏大的尺度、严格的功能分区和自上而下的权力展示，来强行切分城市肌理。至此，公共空间从第一阶段的绝对缺失，螺旋式地上升为第二阶段具有强烈仪式感和控制欲的功能宣示。这种跃迁之所以是上升，是因为它在物理层面终结了公共空间的零状态，确立了其在城市规划中的法定地位并解决了早期的卫生危机；而它之所以呈现为“螺旋”，则是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理性狂

妄,以牺牲传统街道的有机活力为代价,为下一阶段人本主义的再次纠偏埋下了伏笔。

3 宣示——单一性公共空间阶段

3.1 单一性公共空间阶段的特征

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城市对公共空间已有明确、自觉的规划意图,但是此时所塑造的诸种空间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单一性”特征,即空间形式及使用功能都以某一主导、有时甚至排他性的目的为根本。此种单一性显然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直接相关,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崇尚功能分区、讲究效率、热衷宏大叙事,而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又信奉客观、科学、理性规划的城市空间观,因此自然会产生土地使用功能严格分离、街道功能专门化、设计手法高度标准化等诸种结果。更重要的是,现代主义原则本身提倡简洁、开放,故而此时大量大规模广场和开放空间应时而生。

由于公共空间在功能上的单一性,故而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这些公共空间往往未被充分利用或被误用。虽然它们可能很好地完成了其所预定的首要功能,但是很少能支持多样化、自发发生的人类活动。现代主义形式服从功能的信条本身就决定了空间被设计用来承载某一明确的核心功能。因此,广场可以被设计成视觉焦点或正式集会场所,却未必会主动考虑日常休闲、就餐、游戏等诸种用途。

3.2 单一性公共空间阶段的特征案例研究：巴西利亚

巴西利亚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极致体现,其核心特征之一便是严格的功能分区。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扇区,分别承担居住、行政、商业等特定功能(图2)。其居住区被称为超级街廓,由公寓楼群和周边的绿地组成。然而,这种看似



图2. 巴西利亚分区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理想的规划也招致了诸多批评。有人认为巴西利亚没有作为公众聚集交往之所的街道,只有机械化交通工具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虽然有名义上的广场,但那是“死亡的空间”。巴西利亚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官方指定的空间,小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全都不存在了^[4]。

巴西利亚的设计在城市尺度上将“单一功能”的理念推向了极致,餐饮、办公、娱乐、体育等公共功能被限定在指定的区域,导致城市内单一功能的聚集,功能复合度很低^[5]。尽管每个区域被赋予特定用途的初衷是追求秩序与效率,但这种功能上的严格分离,加之巨大的空间尺度和以汽车为导向的交通系统,使得城市生活变得碎片化。其所形成的公共空间虽然往往气势恢宏,却缺乏宜人的尺度和日常生活的活力。

3.3 秩序的异化与人本觉醒：向“多样化空间”的螺旋跃迁

第二阶段的单一性公共空间虽然以强大的理性秩序终结了早期工业城市的混乱,但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彻底暴露。现代主义规划对功能分区与宏大叙事的极致追求,本质上

是一种剥离了具体生活情境的机械化操作。在巴西利亚或各类纪念性广场的实践中,巨大的空间尺度、以汽车为导向的交通网络以及单一的权力宣示功能,使得这些空间虽然在物理层面上是敞开的,但在社会心理上却是冷漠、刻板甚至排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空间塑造,不仅割裂了传统城市的有机肌理,更造成了日常街道生活的消亡,导致市民在宏伟的广场中感受到强烈的疏离感。

正是这种由过度控制和尺度失衡带来的枯燥与冷漠,激起了20世纪下半叶强烈的社会反思。以简·雅各布斯和扬·盖尔为代表的学者及公众,开始深刻批判这种空间机器,呼吁打破功能分区的僵硬外壳,将设计的视点从上帝视角的鸟瞰拉回人视角的平视,让公共空间重新拥抱市民的日常交往与自发性活动^[6-7]。至此,城市公共空间的演进迎来了第二次螺旋式跃迁——从第二阶段自上而下的权力宣示,转向第三阶段关注微观体验的多样化繁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向绝非退回第一阶段的无序混沌,而是在继承了第二阶段现代城市基本卫生与公共秩序成果的基础上,在更高维度上对城市烟火气、人本尺度与混合活力的重新寻回与重构。

4 繁荣——多样化公共空间阶段

4.1 多样化公共空间阶段的特征

进入第三阶段,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向“多样化”转型的趋势,逐渐摆脱以往单一功能、往往显得刻板乏味的状态,转而追求能够容纳更广泛活动类型、服务更多元用户群体、提供更丰富体验的空间^[8]。这一转变反映了社会对公共生活社会价值认识的深化,并在实践中常常融入人性化尺度设计、混合功能、步行优先和社区参与等原则。同时,混合用途开发项目的兴起,将居住、商业和休闲娱乐空间整合在一起,也成为这一阶段

的显著特征。

向多样化的转变实质上是对第二阶段现代主义规划诸种弊病的直接、明确的回应,但此阶段也恰逢消费主义作为强大塑造力量崛起的时代,因此公共空间在追求多样性的同时必然要面对如何在真正的公共性与商业诉求之间求得平衡的问题。对现代主义刻板印象的批判以及对人性化设计的提倡,自然、妥帖地引出了对更富多样性、更有活力的公共空间的实际需求。不过也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随着城市的发展模式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型,“私有化、商品化、符号化”成为消费时代下城市公共空间的三大特点^[9]。购物中心作为典型的准公共空间便是一个生动例证。

4.2 多样化公共空间阶段的案例研究：哥本哈根的斯托罗里耶步行街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受扬盖尔等城市规划学者的直接影响,对城市中心做了极为成功的改造,其中最典型、最突出的是把主要商业街道斯托罗里耶及周围地区改造成欧洲最长的步行商业街区之一。更难得的是,此改造是哥本哈根整体城市政策的一部分,即把提高公共生活品质放在政策优先位置。

由于斯托罗里耶创造了有利于“自发性活动”、“社会性活动”开展的空间环境,故其成功是自然的结果。虽然推行时有若干商户因担心顾客流失而表示反对,但是后来步行化改造确实大大增强了街区的吸引力。

斯托罗里耶步行街是第三阶段公共空间多样化阶段成熟的范例。由于限制汽车进入,因此为行人创造了安全、宜人的步行环境,由此自然、合理地把街道既设计成购物消费的场所,又设计成市民及游客散步、休憩、观察街景、欣赏街头表演、进行社交聚会的理想空间,因而完美地体现了盖尔为人设计的城市的基本原则。更难得的是,斯



图3. 热闹的步行街(图片来自网络)

托罗里耶的实践直接而明确地证明,把建筑之间的生活置于优先地位,既有社会效益,也有利于经济复兴。其最终的成功表明创造鼓励“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的空间,必然带来更多人流、更长停留时间,而二者都会实实在在地惠及商业。故而优质公共空间设计与经济活力之间存在着明确、可感知的正向关系(图3)。

4.3 多样性的反噬与符号重构：向“场景营造”的螺旋跃迁

虽然第三阶段的多样化借助人性化设计成功唤起了城市街道的活力,但是此种活力很快就被资本逻辑充分收编。步行商业街及大型混合综合体的兴盛使本来属于市民自发性、有机性的社会交往,被消费主义予以主导并加以过滤。因此,此时的公共空间虽在活动类型上极为丰富,却也处在另一种隐蔽而危险的困境之中: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及空间的隐性私有化。具体而言,为了攫取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大量所谓多样化的公共空间实为高度雷同的品牌及业态的简单堆叠,城市独特场所精神因此而消解。更严重的是,由私人资本运营的准公共空间以隐蔽的安保监控、消费门槛之方式,系统性地排除低收入群体的空间使用权,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正在实质性退化。

当单纯的功能叠加、大众化的商业繁荣都不能再满足人们对于城市文化认同及独特精神体验日

益增长的诉求时,空间演进的动力就自然而然地指向更高维度。因此,为摆脱同质化的平庸,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形成独特吸引力,城市管理者及资本都转向对文化符号、历史记忆、前沿数字技术予以系统、有层次的挖掘与包装。故而城市公共空间迎来了第三次螺旋跃迁,也正式进入其强调高度策划、沉浸体验的第四阶段:场景营造。难得的是,第四阶段既完整吸收了第三阶段活动的多样性,又以更精致、更隐蔽的方式回归第二阶段对空间主题的强烈控制,只是这一次所控制的绝不是僵硬的物理功能,而是人们的视觉审美、情感反应及文化消费体验。

5 体验——当代公共空间中的场景营造阶段

5.1 场景营造阶段的特征

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第四阶段即“场景营造”阶段,是对公共空间功能、意义都已有十分明确、自觉的扩展。因此该阶段的公共空间设计绝不止是提供种种功能或创造宜人环境,更根本的目的在于主动、系统地营造有意味、有温度的场景,即塑造具体氛围,引导某种体验,培育场所认同感^[10]。与此目标相辅相成的是复杂的场所营造策略、品牌化运作、新兴技术的应用、对可持续性理念的贯彻,以及共同创造或参与式设计等诸种手法。故而该阶段公共空间的表现形式极其丰富,既有可能是对某一主题作极致挖掘、几乎单一体验的主题式场景,也可能是将若干要素自然、妥帖地融合在一起,给人多重感官刺激、富于变化的复合式场景体验。

由于“场景营造”是一种有计划的公共空间发展方式,故而“体验”本身即被当作产品或直接追求的目标,因此能自然地创造出富有创新精神又极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与此相对,第三阶段重



图4. 高线公园及周边环境（图片来自网络）

在活动多样化, 第四阶段则主动、充分地塑造整体体验或场景。

5.2 场景营造阶段的案例研究：纽约高线公园

纽约高线公园是一个将废弃的高架货运铁路线改造为线型空中公园的典范项目(图4)^[11]。该设计把硬质铺装与软质植物种植自然地结合, 因而形成种种微气候环境, 也营造出无明确路径的漫游式景观, 并且保留了高架铁路作为工业遗迹的粗犷之美及野性之美, 又合理地纳入步行、休憩、艺术观赏、社交诸种功能。因此高线公园自开放以后便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公认典范, 极大刺激了周边地区的开发投资, 但其也招致一些关于其造成周边社区绅士化、过度拥挤、对部分原社区居民过于疏离的批评。

高线公园的设计属于典型的、有明确意图的场景营造行为, 把工业废墟变为宜人宜游的场所, 给人多种舒适的体验, 这符合第四阶段的诸种特征。昔日粗犷的美感现被高度规制, 故而所谓野趣实为有意制造出来的结果, 它重用废弃基础设施, 创造了一种有单一性特征但又包容多种活动的体验, 各部分皆被设计成彼此呼应、精致分明的场景。但其所创造的场景虽广为喜爱, 却未必对所有人都真正平等公共、切实有利。

5.3 场景的极限与未来的敞开

第四阶段的场景营造并非城市公共空间演进的历史终点, 而是目前我们所处的螺旋上升的最高圈层。它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姿态, 实现了对历史的扬弃, 它既吸纳了第三阶段的活动多样性, 又重拾了第二阶段对空间精神与主题的强烈塑造, 甚至其物质载体往往正是对第一阶段遗留的工业废墟的重新唤醒。然而, 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 每一次形态的跃迁都会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孕育出新的内生危机。这预示着, 城市公共空间的螺旋式演进绝不会就此停滞, 未来的城市空间必将在反思中开启下一次跃迁。

6 总结

本文针对既有研究中常见的线性叙事局限, 采用理论构建与多案例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一个“螺旋式演进”分析框架, 以揭示城市公共空间辩证发展的非线性逻辑。研究识别了公共空间从“虚空”、“宣示”、“繁荣”到“体验”四个演进阶段, 并着重剖析了推动各阶段螺旋式跃迁的核心动力, 包括政治权力的秩序重建、人本思潮与消费主义的合流, 以及符号资本与技术的深度驱动。该模型的价值在于超越单向阶段发展的简单理解, 强调后续阶段如何批判性扬弃前一阶段的内在矛盾, 从而实现空间形态与公共性内涵的维度跃升。

而且这一框架对于理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演进同样具有解释力。在中国“时空压缩”的城镇化背景下, 多种空间逻辑(如宏大的宣示性、活力的多样性、精致的场景性)常常并存与交织。本研究为辨析其背后的主导力量(权力、资本、社会)提供了工具, 并警示若忽视演进的内在矛盾, 只追求形态的“进阶”可能导致公共性实质的缺失。因此决策者要有“螺旋式”历史视野来诊断

现行主要矛盾,设计者在“场景营造”中要主动守护公共性并为自发性活力留出空间,治理者宜建构多元协同机制以保证空间发展的社会包容性。

参考文献:

- [1] 城市公共空间[G/OL]//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2026-04-11].<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529216&-Type=bkzyb&SubID=146621>.
- [2] 梁远,刘金源.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J].安徽史学,2015,(04):141-148.
- [3] 黎凯熙.18世纪曼彻斯特的交通变革及其影响[D].华中师范大学,2024. DOI:10.27159/d.cnki.ghzsu.2024.002513.
- [4] 王小章.“国家的视角”及其反面[J].读书,2025,(05):24-32.
- [5] 赵守谅,卢诗霞,陈婷婷,等.理性的辉煌与局限——巴西利亚规划60年回溯[J].国际城市规划,2023,38(01):133-143. DOI:10.19830/j.upi.2020.574.
- [6] 雅各布斯,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 [7] Gehl, J. 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1.
- [8] 汪留成,汪珊珊,黄淑娟.功能混合型社区户外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以上海杨浦区大学路创智SOHO为例[J].规划师,2023,39(10):105-112.
- [9] 杨震,徐苗.消费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及其理论批判[J].城市规划学刊,2011,(03):87-95.
- [10] 黄瓴,夏梦.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社区第三空间识别与营造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渡口社区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24,(03):109-115.
- [11] 金珊,李云,伍惠婷.纽约高线公园作品解读——略论城市公共空间的复兴与转型[J].建筑师,2018,(04):69-75

Beyond Linear Narratives: Evolu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al Development

Li Canjun, He Ke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spaces is not a straightforward linear process, but rather a complex, spiraling upward progression. It proposes a four-stage evolutionary model encompassing the absence of public spaces, single-type public spaces, diversified public spaces, and scene-making. A critical analysis is then conducted on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each stage, revealing how subsequent stages absorb, transform, and transcend the features of their predecessors. This leads to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urban public spaces, fostering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tial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s.

Keywords: Urban public space; Spiral evolution; Publicness
